



臺灣政治學研究論壇：

現狀評估與趨勢前瞻

**Forum for Political Science in Taiwan:
Retrospection and Prospecption**

湯京平、寇建文、蔡佳泓等



臺灣政治學研究論壇： 現狀評估與趨勢前瞻

湯京平、寇建文、蔡佳泓等

前言

有鑑於政治學領域從傳統的政治制度發展到政治行為，再結合最近的資料科學、因果推論等領域，臺灣政治學界有必要評估目前的現狀，並且提出未來前瞻的研究方向。另一方面，每年有許多想要出國留學、博士後研究，以及休假進修的學生或是年輕學者，政治學界需要提供這些學生或是年輕學者申請海外深造前一些可能的方向指引。因此，在2017年6月20日於國立政治大學舉行「臺灣政治學研究論壇」，邀請國外學者與本地學者共聚一堂，討論現狀評估、趨勢前瞻、串連臺灣與國際學界等主題。

「臺灣政治學研究論壇」採取座談會形式，分為三個場次，場次一主持人為湯京平（國立政治大學），與談人為林澤民（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徐斯勤（國立台灣大學）、連培德（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蔡宗漢（國立政治大學）、鄭敦仁（College of William & Mary）；場次二主持人為寇健文（國立政治大學），與談人為牛銘實（Duke University）、王德育（Illinois State University）、王業立（國立台灣大學）、沈筱綺（國立清華大學）、薛健吾（國立政治大學）；場次三主持人為蔡佳泓（國立政治大學），與談人為李偉欽（Wake Forest University）、黃紀（國立政治大學）、童涵浦（國立台灣大學）、廖達琪（國立中山大學）、謝復生（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本活動以正式論壇的討論意見交流的方式，彙整國內政治學界的長處，討論各種策略的可行性，藉此提供一個開放平臺給予有志從事學術相關研究的新進學者及年輕學子。透過此次論壇的豐富性，不僅能讓國內研究者拓展其視野，並可以讓政治科學研究繼續在臺生根與茁壯，帶進國際當前新興研究，強化研究能量並提高我國在世界的能見度。活動結束後，整理其論壇內容，將此成果公開共享，讓無法與會的學者或學子，同樣有機會可以了解當前政治學研究所面臨的問題與挑戰，共同迎向臺灣政治學界新局勢。

場次一：政治學研究的重要趨勢

主議題：政治學研究的重要趨勢

提議人：鄭敦仁（College of William & Mary）

在目前五個政治學領域（政治哲學、比較政治、美國政治、國際關係與公共政策）研究上，雖彼此間之界定並非嚴格，各該領域間亦具一定程度的穿透性，然此五大領域仍為政治學研究之主流。各領域間之研究仍較為封閉的形成了五個獨立的研究圈。

而此五大主要研究領域在近年來受到挑戰，史丹佛大學Justin Grimmer教授認為，政治學的知識產出於供給與需求面無法交集，使得攻讀政治學學位的情形減少，不論國內外大學皆有此現象。因此他提出政治學研究的新興領域，試圖打破以往政治學五個封閉的研究領域，其研究內容包括下列五項：

- (1) **Justice and Law**：屬於價值判斷與規範性（normative）的領域，將過去的政治哲學、比較政治與國際關係放在同個框架之下，研究跨國政府間、或各國國內的制度是如何產生的。
- (2) **International Affairs**：屬於國際事務領域，研究國際間的合作與衝突，其主要在於探討國際關係的行為面。
- (3) **Political Processes**：研究政府如何決策，以及不同政體間之決策有何差異等議題，此為比較政治與美國政治的行為面研究。
- (4) **Political Economy**：屬於政治經濟學領域，研究政治如何決定社會資源的調配。在以往五個政治學研究領域中，皆會應用到此政治經濟學部分。
- (5) **Data Analysis**：資料分析領域。即如何分析資料或預測變數，主要在於方法論的探討。

上述新的五大領域應用於教學與研究，可滿足莘莘學子對於政治知識的追求；除此之外，政治學研究領域的變化，隱含政治學試圖解決一些社會存在已久的問題，像是貧窮為何存在？戰爭為何出現？貧富不均為何發生？國家之間的發展為何有所差異等等議題。另一方面，政治學應與其他領域連結，例如經

濟、法律、心理學與社會學等，使得政治學知識產出的供需達到交集。

然而，政治學研究領域的改變也可能遭致質疑，舉例來說，研究領域改變將重新組合教學課程，而是否又會因而影響到研究領域？研究是供給導向（supply driven），而教學是需求導向（demand driven），當教學順應趨勢改變，滿足學生對政治學知識的需求，研究領域是否隨之產生變化？鄭老師認為，今日的學生可能是明日的教授，因此，政治學在教學內容上的改變，勢必也將慢慢影響到往後的研究方向。綜上所述，鄭老師預期到，新興的五個研究領域將在政治學研究上產生很大的震撼。

鄭老師對國際政治經濟學（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新趨勢也有一些觀察。第一，糾正過去集中於研究成長的思維，認為分配面應受到更多關注；Thomas Piketty 出版《21世紀資本論》轟動學界，成為最好的註解。第二，國際政治經濟學（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與比較政治經濟學（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兩者已相結合。第三，數據的測量與實驗設計變成主流，如果政治學知識的產出無法測量或是透過實驗證明，將難以投稿到較好的期刊。第四，研究少以理論為出發點，而是透過資料分析的途徑發現謎題（puzzles），再加以數據測量與實驗作為檢驗，微觀研究成為顯學，宏觀理論乏人問津。

提議人：連培德（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連老師認為政治學的研究很重要，但不應只是為了研究或建立高深的理論，而忘記研究政治的目的。連老師以自身經驗為例，認為研究政治是為了將研究所學貢獻於社會，尤其是對於社會上弱勢族群的關注。連老師主要研究的範疇為「認同」（identity）之相關領域，此並非傳統政治學研究領域，是為跨領域的學門，受傳統政治學所忽略。亦由於本身研究領域及學歷與一般政治學者不同，因此能觀察到其他政治學者難以觀察到的現象。連老師認為政治學應拓展邊界，將傳統政治學與不同領域整合，賦予政治學新的生命。

除此之外，連老師提到以往研究政治學會將行為面與制度面分開探討，新的趨勢則是將兩個領域合併探討，探討行為時應考慮其所受制度面之影響、探討制度時亦應考量其對於行為所產生之影響。舉例來說，研究黑人平權或女

airiti

權時，最近出版的相關書籍皆探討到：以往的抗爭或抗議是如何形塑今日之政策？這便是超越了過去在研究上將行為與制度二分法的層次。

連老師認為移民研究於美國受到較多關注，例如：移民如何融入美國社會，或是少數民族的相關政策是否有助於少數民族的生活等問題。但老師認為，臺灣也是值得發展移民研究的地方。除此之外，連老師認為，以往美國政治的研究領域集中在中央政府層面（例如：美國國會與憲法等），但新的趨勢是將政治學研究重心放在地方政府或州政府，研究地方政府的政策制定、地方政治人物如何當選，以及其地方代表的政治理念等。

提議人：林澤民（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林老師主要探討1980年代至2010年代政治學研究方法的演進（演講題目為：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Methodology 1980s-2010s），主要聚焦於計量方法的改變。林老師認為計量方法的變化相當迅速，一直到現在，林老師本身亦在學習計量模型的運用。

1980年代，線性迴歸模型以OLS與GLS為主，非線性模型則以Logit與Probit模型為主，比較複雜的模型包括共變異數結構模型（Covariance structure model）、測量模型（Measurement model）與結構模型（Structural model）等，除此之外，在時間序列（time series）、Stationary ARIMA與Granger Causality也被有所研究。

1990年代，最大概似法（Maximum likelihood method）成為主流，其衍生的模型，包括Discrete choice model、Event count model、Event history model、Model with limited dependent variable與Selection model（Heckman或Tobit等）皆受到關注；而在時間序列方面，單根檢定（Unit roots）及Nonstationary Process等計量方法的出現，代表以往時間序列的估計結果是有偏誤的。

2000年代，部分學者認為政治學應回歸理論面的探討，而當時美國國科會提出EITM（Empirical Implication for Theoretical Model），認為政治學理論研究應與實證結合，實證研究背後應有理論論述。另一方面，此時的資料類型不再只是橫斷面或時間序列，而是結合兩者性質的新型態資料，出現了許多新興的計量研究方式，例如貝氏推理（Bayesian inference）、因果檢驗與實驗研究

等。

2010年代，機器學習對於政治學計量研究帶來新的變革，機器學習和以往計量模型不同之處在於，機器學習不建立統計模型，而是利用電腦程式預測變數。

提議人：徐斯勤（國立台灣大學）

徐老師主要針對中國研究近20年來的發展。中國政治的研究面臨兩種趨勢消長，其一為，中國研究開始將中國放進比較政治的架構，將中國視為比較政治體系之下的一般國家，而非特別案例；其二為，中國研究挑戰了現有比較政治的理論架構。

以第一點來說，近年來中國研究試圖將中國放入較為寬廣的比較政治架構，打破以往將中國放入個案的思維，而是將中國視為一般國家，與其他國家進行比較。

以第二點來說，徐老師以近年來逐漸增加的實驗研究為例，中國研究所使用的方法，如果沒有考慮到中國的文化差異，其結果可能會有所偏誤。另外，中國的選舉研究雖一直受西方國家關注，但近年來相關之研究文獻卻沒有增加，其原因在於，中國各地區的變異大，不同地區的發展程度與選舉過程並不相同，即使利用全中國的資料估計變數之間的關係，該結果本身並無意義，無法代表中國各地區的性質。因此，徐老師認為應以中國各地區作為研究標的，且觀察近年來之研究文獻，與各地選舉相關之研究有增加的趨勢。

最後，徐老師提到研究中國的困難點之一是：中國公開資料可信度不高，除非擁有第一手資料或深度訪談之機會。但第一手資料的問題在於，自從18大之後，訪談各地官員更為困難，且取得的第一手資料並非受其他學者的信任。因此，中國公開資料的可信度可說是中國研究的根本問題之一。

提議人：蔡宗漢（國立政治大學）

蔡老師研究興趣為政治學方法論，認為政治學計量方法的發展越來越多且越來越複雜，以往使用統計模型的研究者只需會統計模型背後的概念及統計軟體的應用，但現今的研究者在使用計量分析時，除了瞭解統計模型的假定與基

本概念之外，也要熟悉且撰寫分析資料所需的程式語言。

同時，由於統計模型的發展越來越複雜，也引起對於政治學研究太偏技術性的批評。這樣的發展是因為以往政治學簡化了人類行為或政治的過程，以較為簡單的模型分析，但後來發現政治過程或政治行為並非利用簡化的模型就可描述，因此使得統計模型變得更為複雜。蔡老師認為，在統計方法技術面要求提高的今日，研究者應結合新的技術與理論，先瞭解政治學理論的意涵，再利用適當的統計模型驗證理論。所以雖然目前統計學的技术很多，但其重點在於，應瞭解新的統計方法適不適合政治學研究者的研究主題？否則一味追求統計模型的精進，反而容易忽略了政治學理論。

場次二：台灣政治學研究的現狀與評估

主議題：台灣政治學研究的現狀與評估

子議題1：政治學的教學與研究經驗談

提議人：薛健吾（國立政治大學）

薛老師談的兩項主題為教學與研究。關於研究的部分是討論縱橫資料（Panel data），也就是跨國跨時的追蹤資料或是面板資料，而老師的研究專長主要在於探討國際關係中一般理論（general theory）的發展現況。由於老師平日教學上所教授的是研究方法論，他提到當他在詢問同學們一篇文章中的自變數（independent variable）、依變數（dependent variable）、控制變數（control variable）或理論（theory）各是什麼時，時常研究生是回答不出來的，甚至博士班的同學也是，老師表示這些應該是最應具備的基本知識，如單從這個現象來觀察，老師認為我們在教學上應該還需要更加著重於研究方法的訓練，才能促進同學們的研究能量。

薛老師自己的研究領域是試圖建立國際關係中的一般理論，所謂的一般理論指的是能夠解釋某些通則性現象的論點，例如「民主有利於經濟發展」或是「民主國家之間極少發生軍事衝突」等等，都是國際關係研究中著名的通則性現象，而因為所建立的論點是關於通則性的現象，所以要驗證這些論點，自然也要使用通則性的經驗證據來驗證，而比較理想的通則性證據就是panel

data。根據他自己的整理，他發現台灣政治學界關於panel data的文章，近十年來在台灣政治學刊、東吳政治學報、問題與研究、中國大陸研究、政治科學論叢、人文與社會科學集刊、遠景基金會季刊和台灣民主季刊等幾本TSSCI的期刊中，只有不到15篇是使用panel data來做國際關係研究的文章，且都集中由5、6位老師所發表，整體來說數量是偏少的。老師認為政治學科如果要蓬勃發展，應該是各項研究議題、研究方法都有豐富的發表，而目前台灣政治學科領域在panel data和一般理論的建立這個部分似乎較為缺乏。老師也希望透過教學，教導學生如何使用panel data從事研究。

薛老師提到，檢驗通則化理論的正確與否，也就是驗證某種範圍內的國家是否都能適用此理論，因此所需要的資料便是某些國家在某段時間的資料，證明其具因果關係。而因果關係包含三項條件：第一是自變數要發生在依變數之前、第二是自變數與依變數之間要有關聯性、第三則是要排除其他可能的敵對解釋，剩下來的影響就會是自變數的影響。在建立通則化的理論時，panel data可以提供時間、空間、關聯性的資訊以及其他敵對解釋關聯性的資訊，因此是一項重要的研究工具。在薛老師的教學經驗中，他發現台灣的同學較少接受到panel data的訓練。

比較政治學者ArendLijphart在1975年在《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發表過一篇文章「The Comparable-Cases Strategy in Comparative Research」，在文章中他列出做研究時可以採取的不同研究方法，第一種就是透過作實驗來證明因果關係，也就是實驗法，其可以有效控制其他影響因素都不存在，且理想的狀況是做一個隨機性的實驗，然而老師也提到這在社會科學中是很難做到的，就如無法將中國大陸關在實驗室中，讓其經歷民主化、再觀察它是否會經濟發展。第二種研究方法是observational data，利用已經被觀察到的資料來驗證因果關係，其中包括三種方法：第一種是統計法，通常適用於個案夠多的研究；第二種是比較研究法，利用「最具差異法」或是「最具相似法」來證明關鍵自變數對依變數的影響；第三種則為個案研究法（case study），利用process tracing的方式來探討自變數是透過了哪些一連串的過程來影響了依變數的發生，並且排除一些重要的敵對解釋來證明因果關係。薛老師希望透過介紹不同的研究方法來鼓勵同學，盡量習得不同的研究方法，才能善用適切的研

究方法來對各種不同的題目進行不同的研究。

薛老師總結同學們經常向他反應學習上的三個問題，第一是學校是否能開授較為「親切」的統計課程，讓他們可以不用害怕統計這個領域；第二是需要更多如何運用Stata、SPSS和R等統計軟體的課程，而第三則是如何應用這些統計軟體進行資料的合併、整理以及繪圖。這些課程都是做經驗研究會直接需要用的技能，因此如果能開授更多相關的課程，相信對於提升同學們的研究能量會有很大的幫助。

子議題2：台灣政治學的現況

提議人：王業立（國立臺灣大學）

王老師演講內容主要可分為三個部分，由於老師的研究專長是比較政治領域，因此第一個部分主要是談21世紀以來，台灣比較政治領域的現況。老師認為近年來台灣的比較政治領域發展的相當不錯，有相當多的議題與國際接軌，舉例而言，從21世紀一開始，包含像是黃紀老師、湯京平老師等所做的分立政府的相關研究，有許多關於中央與地方分立政府的比較研究，這方面有相當多的論文產出；另外台灣比較政治領域中的台灣選舉民主化調查，無論是台灣本身資料上的累積或是舉辦國際大型國際研討會等都有重要的學術貢獻；另外在比較政治領域裡，由吳玉山老師領軍的半總統制的研究，探討台灣半總統制的運作和國外許多半總統制的比較研究，也辦了很多國際研討會以及專書與專書論文的出版；其次是台大的東亞民主研究，包含做了很多亞洲民主動態調查以及出版專書等；再來中山大學廖達琪老師所做的i-Voting研究，在網路民主及網路的政治參與方面也有許多國際論文的發表。最近幾年在台灣包含像是國會研究，盛杏媛老師等也都有參與；而最近東吳大學剛成立了一個關於國會研究相關的學群，相信未來幾年國會研究也會有更多的研究表現。老師對於這些年來台灣在比較政治領域的發展給予肯定，與國際上主要學術界的互動與對話也表現良好，並希望未來在研究上持續強化。

第二部分則是針對未來的台灣比較政治學領域仍有那些可以著力的重點，以及哪些研究議題值得探討。王老師認為新媒體的政治是個研究重點，從阿拉伯之春到2014年太陽花學運，新媒體顛覆傳統的政治，無論是在政治溝通、

政治參與等，在這方面台灣因為太陽花學運後有很多的經驗，也鼓勵台灣學者對於媒體政治可以多下些功夫；另外則是大數據、資料科學方面，台灣許多學者也逐漸重視這一塊，老師相信台灣學者可以與西方的學者共同拓展這塊新興領域；再者，回到台灣比較政治領域本身，如有國外的學者想要進行台灣的研究，老師認為有幾個方向可以思考：第一是台灣作為一個新興民主國家，可以與其他新興民主國家間不同層面的對比，例如從70、80年代開始就在研究台灣與韓國在經濟發展上的比較，透過如中小企業與大企業間的對比；現在的話可利用剛剛談到的panel data做更多新興國家之間的比較分析；第二，台灣身為半總統制國家，雖然由吳玉山老師領軍的研究也做的蠻多的，但是台灣和其他國家在半總統制的運作上互相的比較也是一項很好的切入角度。另外，就是選舉制度的研究，如台灣、韓國、日本為並立制，德國、紐西蘭是聯立制，台灣本身作為並立制的代表性國家，跟其他國家在比較上也有一些可以著力的地方，台灣的選舉研究可做為重要的個案討論；第三個研究議題則是台灣的地方政治，從50、60年代開始，國外的社會學、人類學學者對台灣非常有興趣，來台灣作田野調查，發展出侍從主義、人際關係網絡等理論，但是這些傳統的理論在今天面臨到很大的侷限。民主轉型之後，台灣地方派系政治的發展，是否有新的理論可以突破？以及從國外來看台灣的地方政治和其他國家的地方政治、草根民主的比較等，老師認為這方面也是台灣可以與國際社會間接軌的可能。以上談到的幾個研究方面或許是大家可以來加以思考的。

第三個部分則是回應上一場次，台灣學生目前出國留學的情況，留學生人數下降的原因。王老師發現不僅出國留學生越來越少，出國取得學位後回來任教的人也越來越少。探討這問題背後的原因可能和台灣整個大環境也有關聯。舉例而言，很多學生在準備出國念碩士、博士的時候，可能很少人已經立定志向就在國外發展，大部分選擇回國任教。但很多人根本是不願意出國念書，台灣因為少子化的現象，很多大學增聘老師就有問題、許多私立大學可能再過三、五年就得關掉一半，所以現在出國念書回來台灣後，很難找到工作。這是很多人擔心的，也就是投資報酬率高不高、投資風險為何的問題；再來，因為台灣薪資結構問題，對於助理教授而言，如果在台北工作，一半的薪水是要負擔房租、生兩個小孩根本養不起。而這種情況之下，是否有意願投資好幾百萬

去美國念博士，但回來後拿到的薪水卻不符合自己的期待；另外，關於課程方面，統計、資料科學都會在未來成為很重要的工具，但問題是學生本身修習這些課程的意願，因為政治學系本身為文組，對於修習統計學等需要用到數學的課程可能就望之卻步。

以上這些關於出國留學和修習資料科學等問題都具有其結構性的因素，需要針對問題做通盤性的了解，才能鼓勵學生勇敢追求自己的夢，否則，只是單方面的讓政府提供資金，鼓勵學生趕快出國留學後回來貢獻所學，能達到的成果有限。

寇健文老師補充：

年金改革的問題會造成長期、尤其是十年以後對學界造成影響，因為原來我國唯一能夠和國外競爭的就是退休福利較佳，但現在這個福利也沒有了。

第二個問題是新南向政策，涉及資源分配的問題。寇老師認為，政府鼓勵學生到東南亞進行東南亞研究是必要的，但比較好的方式應該是應繼續支持同學到全球頂尖的大學取得學位，但可以額外補助這些在國外攻讀學位的同學到東南亞當地學語言、學習當地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的知識一到兩年。一方面我們的學生能受到最好的訓練、進入最頂尖學校的關係網絡，同時具有進行區域研究所需要的語言和其他必備知識。這樣的話，我們同學的國際移動與國際發聲力量會更強。

子議題3：如何提升台灣政治學研究在國際的能見度

提議人：沈筱綺（國立清華大學）

沈老師首先談論到如何提升台灣政治學研究的國際能見度方面，如同王業立老師提到的，關於以台灣為研究題目的政治學研究Taiwan studies已有很好的研究，只是在國際上可能較未被注意到。沈老師認為這中間需要一個中介的平台，老師提到這其中有兩項資源較沒有被利用到。其一，在美國或歐洲做比較政治的學者可能較沒有觀察到，台灣的研究其實和他們的研究是有相關的、可以相互連結的。沈老師舉自己的經驗為例，當初她在哥倫比亞大學念書時，教授Snyder所做的研究是關於國家認同的衝突跟民主化過程之間的關係，沈老師認為在這個議題上台灣就可以提供一個很好的理論視野或是經驗上的例證。但

是目前缺乏這樣將學者和其所感興趣的研究議題的相關資訊做連結的平台。平台有一項很重要的角色是，舉例來說，像是EFSA也有個Taiwan study group，就沈老師親身參與的經驗中，她發現去參加的學者中較沒有擴大到美國學界研究比較政治領域學者，大多是本來就在研究台灣或中國的學者。沈老師認為可以透過邀請Snyder等學者來台灣擔任研討會的主持人或評論人，這樣就可以讓他發現原來在台灣有學者也在進行他所感興趣的研究題目，並與他的研究有連結性，或許這樣就可以讓台灣加入國際研究計畫之中。

另外一項重要的資源則是，在美國的重要大學念書的台灣博士研究生，由於他們很了解台灣研究的相關成果，而他們也很清楚系上的老師正在或是未來要進行的研究計畫、所關心的研究趨勢，因此，如果能夠固定舉辦工作坊讓這些博士研究生回來分享他們老師的研究取向，這樣或許能讓未來台灣學者更能夠到與自己研究興趣相仿的大學做訪問學者，透過這樣的方式或許就更能融入到國際研究之中。否則，當看到西方學者發表相關成果到期刊上時，通常是經過三、五年後研究成果已經做出來了。如果能夠在國外學者研究的初端就讓台灣學者同時加入研究，這樣應有助於台灣的政治學研究提升國際能見度。

接續到前一場、也是王老師提到的問題，如何能幫助學生進入國外好的大學。沈老師由於曾為哥倫比亞大學招生委員會的一員，她提到通常台灣學生是歸類在China studies 裡、與中國學生一起競爭，因此通常會因為研究生大多是中國學生而選擇錄取中國學生為主，且中國頂尖大學目前與美國重要大學有很多合作計畫，台灣好的老師也會到中國大陸上課，因此中國大陸的研究生也可以拿出許多重要大師的推薦信，導致台灣學生與中國大陸學生競爭時很難爭取到名額。有鑒於此，政府是否有其他的方式將國內好的學生推到國外好的學校，舉例而言，台灣學生可以因為取得政府公費留學獎學金而經歷較少上述的激烈競爭。

另外，老師舉例當初她在拿到Fulbright獎學金時，主辦單位請他填五個學校，而由單位來幫她申請，這樣的方式或許也能提升錄取的機會；再者，關於留學獎學金的部分，沈老師認為拿到公費獎學金必須回台服務的規則似乎與希望將台灣優秀人才留在美國重要大學的理念不一；還有，老師也提到希望台灣公費留學獎學金的資助時間可以拉長，這樣才可以使研究生將他的精神完全

放在研究上，而不需要在就學期間額外花費心力自己再去找funding。相較之下，美國的獎學金提供較為多元，就連去田野調查也會有相關的資助。

沈老師也認為台灣政治學研究提升國際能見度的途徑包含，第一，提供在國外攻讀學位的博士研究生最足夠且適合的資助，因為這些研究生可以幫助台灣政治學研究與國際研究接軌。第二是如何將他們在國外重要大學接觸到的一手資訊帶回台灣，甚至將台灣研究提升到國際的層次，與國外的團隊共同合作研究。

子議題4：如何提升台灣政治學的能見度

提議人：牛銘實（Duke University）

牛老師首先談論台灣政治學的學術生態，依據他在國外的觀察，他認為台灣的政治學發展的很不錯且具有相當活力。以美國來說，美國的政治學者有好幾萬人，但是能夠在好的期刊上發表論文的學者非常的少，且由於美國的教學型與研究型大學分界非常明顯，大約只有一、兩百所研究型大學，其他都是教學型大學，而教學型大學就較沒有出版期刊的壓力。而台灣的政治學教授只有三、五百人，卻在研究上有很高的產出，以比例來說，台灣學者在科研上是非常有生產力的，比美國的政治學者的研究產出還高出許多。老師以自身在杜克大學教學的經驗為例，他每年會告訴新加入的博士生，如果假設美國有一百間研究型大學，每年他收十個博士生，也就是一千個博士生，而在這一百所大學中，每間學校有三十個政治學教授，也就是共三千名政治學教授，每個人服務三十年，也就是每年會有一百個教授會退休，但是我們每年收一千個學生，也就是說這一千個學生以後要拚這一百個工作，這個競爭是相當激烈的。但牛老師認為學術就是千錘百鍊的過程，雖然過程中會有挫折，但這是選擇成為學者必經的過程。

老師歸納他前面所述，第一個就是他觀察到台灣政治學研究學者總括來說是非常不錯的，他也提到韓國的政治學者雖然人數頗多，但就論文發表的質量上來說並不比我國優秀。且韓國的政治學研究生在拿到博士後，較傾向回到本國任教，較沒有出版的壓力，因為韓國的體制、激勵機制較為不同。老師肯定台灣政治學領域到目前為止的發展，其特殊的處境造就許多有趣的研究題目，

像是王業立老師早期研究台灣特有的SNTV（單記不可讓渡制）、還有像是半總統制、台灣地方的派系、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等等。牛老師表示他也從台灣這特殊的處境獲得許多研究上的發想，像是美國對台灣的安全承諾為甚麼會是策略性模糊，對南韓則否，進而想到模糊ambiguity可能是一種策略，探討它甚麼時候是一種好的策略，再繼續使它發展為the theory of ambiguity，而這些最初的概念就是探討美國對台灣的安全承諾，當它變成一個理論時，台灣就只是其中的一個例子，一個具有啟發性的開端。

牛老師提到他曾寫過關於策略投票的文章，就是1994年台北市長選舉，選舉人為陳水扁、趙少康、黃大洲，三個人那時票數還蠻接近的，老師便以這個例子來看策略投票的理論如何套用在台北市長的選舉，發現沒有太多的理論可以套用，老師就開始寫這方面的文章。這幾年陸續寫了幾篇關於選舉研究的文章，都是從1994年台北市長選舉的概念做衍生，但文章中主要著重的仍是因之發展出來的理論模型，例如賽局理論模型等。

牛老師表示本身對於研究方法論較不熟悉，但他很會找尋研究題目，例如：小國在國際上的生存之道，像是烏克蘭、越南等小國的政治、經濟發展，抑或是台灣作為國際上一個小國的政治、經濟發展等等，老師提到台灣跟大陸每年的經貿總額等於美國與日本的貿易總額，雖然政治上台灣與大陸是對立的，但經貿上往來卻是密切的。因此，很多關於台灣研究有趣且值得探討的研究題目都可以從這樣的過程發想。牛老師提到像是湯老師主持的琢玉計畫、參加台灣政治學會去發表文章，透過發表自己的論文並獲得評論人的回饋的方式可以快速強化文章的品質。老師另外談到暑假舉辦的研究方法班，老師表示已和科技部建議參加這個課程表現優秀的同學，可以送他們出去參加ICPSR、EITM關於研究方法的培訓班，同學透過這些課程也可能有機會請授課的老師幫忙撰寫未來出國留學時的推薦信，且在留學時除了GRE、托福成績外，可以是另一項證明自己對於政治學領域付出的認證。

牛老師總結表示，在國內很多老師已在做這方面的努力，這些老師的目標就是在創造一個環境，讓有對於政治學有興趣的學生能夠有越來越好的發展和機會。

子議題5：提升台灣政治學的國際能見度

提議人：王德育（Illinois State University）

王老師表示，政治學的台灣研究實際上有很多研究方向可以切入。首先，老師認為需要把個人的研究問題放在大的理論框架裡，這樣這個研究就不只是區域研究，而是在這個大理論框架中的一個個案，甚至可以做比較研究；再者是從台灣政治學界提供研究資源給其他外國學者，讓台灣與國外學者共同來做研究。在研究過成當中，因為大家做研究都需要資料，因此如果能夠分享資源給國外學者，他們就可能來做台灣的研究，也更可能提高台灣政治學在國際的能見度。上述是讓台灣政治學提高國際能見度的方法。

王老師接著提到，國際間的台灣研究其實一直佔有一席之地，台灣早期的研究是從歷史觀點來看，像是學者George Kerr的Formosa betrayed，到了70年代，主要是做台灣的經濟發展，探討新興工業化國家之間的比較，而到80、90年代，台灣經濟起飛後，隨之而來的是民主化的議題，到了90年代以後則是探討民主鞏固的議題。現在的研究議題則包括台灣民衆對政權的滿意度與兩岸之間的經貿關係等議題。另外，王老師也認為兩岸之間在政治、軍事關係如此緊張下，經貿關係仍能那麼密切是有違邏輯的。而究竟為甚麼會有這樣的狀況呢？現行的理論是否能夠解釋？如果不能解釋，我們應該怎麼詮釋這樣的情況？第二個問題則是它所造成的結果是甚麼？這便產生台灣民衆的認同問題。因此，在這樣的架構下，關於公民投票等議題便開始出現。最近的台灣研究便是關於選舉研究，台灣在進入民主鞏固期之後，很多學者是在做這一塊。關於選舉研究部分，傳統上包含三大項目（the big three）：政黨認同研究，議題研究與候選人研究（party ID、issue and candidate），最新的項目則是探討台灣民衆的認同問題如何影響到選舉行爲。除此以外，像是制度性的改變對於選舉行爲的影響爲何。另外可以研究的就是台灣的外交關係，像是美國對台灣的策略模糊，研究美國對台政策的問題。

王老師上述歸納了政治學的台灣研究可以研究的議題、曾經做過那些議題，這些做過的議題都可以是很重要的切入點，這些切入點最重要的是將他們放在大的理論架構底裡面，否則就只是區域研究。如果想要將文章發表在比較好的學術期刊、獲得其他學者的注意時，文章本身須具備比較性抑或獨

airiti

特性，且研究問題是被放在大的理論架構下，這樣的話這些文章出版能力會更強。王老師最後提到未來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題目，像是研究台灣政治分歧的問題，並與其他具有政治分歧問題的國家相互比較。另外像是世代變遷 generation change 的研究，這不只是台灣獨有的現象，韓國、美國也有，可以互相做比較。

王老師最後總結，能夠提升台灣政治學的國際能見度的途徑就是提供資源，老師認為在這方面政治大學的黃紀老師所帶領的TEDS團隊做的非常好，因為它無條件地將研究資源開放給大家，使台灣政治學的實證研究快速成長。如果拿台灣的實證研究與日本、韓國發表論文的篇數來比較的話，會發現台灣的實證研究篇數非常多。在美國的選舉研究，ANES同樣也是無條件的開放資源給大眾。因此，如果要提升台灣政治學的國際能見度，分享資源是非常重要的。

場次三：串聯台灣與國際政治學研究

主議題：串聯台灣與國際政治學研究

子議題1：如何連結外部與內部的人才

提議人：李偉欽（Wake Forest University）

講到連結人事物的議題，必須思考人與事甚至與財的部分，想連結外部的人，自己也要走出去。做研究的主題時不需要拘泥於考慮每個人的成長環境，連結人才的一大重點主要還是在於人進人出。談及人進人出帶來的影響，李老師認為，學者在蹲點某一主題待一段足夠長的時間後看法就會改變，且不一定是由自己來發覺這種改變，也有可能是透過別人發掘到自己的改變。想要招募優秀的國際人才，馬上要思考到財的問題，比如說一些好處與利益的誘因，李老師並提及牛銘實老師在先前場次就提過的年金改革也是類似的例子。

而在國家政府所能提供的財力支援上，中國大陸就是典型的例子，關於這一部分他們在培養人才的努力相當可觀，當然中國大陸也有好有壞，比方說台灣的優點是民主社會，研究議題沒有甚麼侷限性，這就是對岸所比較不及的地

airiti

方。但在議題方面，既然我們講的是台灣研究，如果做的是台灣的主題或是區域研究領域的話，基本上理論要牽出去。李老師並舉例自己出身台灣，對台灣非常熟悉而且有情感上的連結，那在做的時候就要把外面的理論拉進來，基本上也是一個相互比較的意味。

再回到人的部分，人在做研究的時候比方說在國外，不可能只做台灣研究，李老師自己的研究就涵蓋各種類型主題，他並自嘲「不安於份」，一個議題沒辦法待很久但幾年後會持續追蹤。因此在議題方面要有所連結的話，可以做台灣的研究絕對沒問題，但是可能要把其他領域的東西也帶進來，跨領域的做法非常重要。先前跟科技部在「密室會議」的時候，李老師有講到政治科學的重要，但是政治社會學也很重要，政治經濟學也很重要；比如說在政治科學領域的訓練時，最好還是念點經濟學，當然不是說非要念到專家大師的程度才可以，也不是說念政治社會學時就要念到能夠走出去進行一種革命，比如社會行動才罷休，而是說在跨領域學習上能夠讓自己更廣闊。當然做台灣的議題還有一種方向是比較政治領域，比方說有人做台灣韓國的比較，又或是台日的不同，像這些的議題就是比較可以拿進來，這是第二個方向。而第三個方向則是財務的問題，個人的考慮跟外力的考慮是不同框架的，李老師並藉機抒發他的看法，他認為台灣的學生出去在國外的政治學界，會盡量希望他們可以在國外定下來，這一部分跟以前的想法不同，過去的想法是希望這些留學學者能夠回國，但現今台灣環境已經飽和的情況下，也希望學子們在外面能夠有所立足，這當然不僅是生涯規劃，也有國際話語權，政策宣佈上的考量。

當然到現在為止講的就是R1等級的學術機構，這邊忘記了還有R2跟下面的(D1,D2)，有些人從台灣退休後就到了人文學院，當然這是看個人，李老師提及自己的學校就是R2的，或者是大學，但是基本上還是人文學科，但是好處就是能發掘教學的樂趣，李老師跟他的同事聊天講到希望他們在訓練那些研究者時請給他們機會要能夠教學，或許是年紀大了，看很多學生都像自己的小孩一樣，所以在教學過程的滿足程度是蠻不錯的，以上是人文學院給他的一些想法。一方面可以做研究一方面也能獲得很多福利，比如說他自己就跑了五個項目，今年秋天就到維也納蹲點去了，藉由蹲點的經驗能夠讓學者了解一個國家：第一個月像旅遊一樣熟悉環境，第二個月則是針對鄰近區域的了解，再

久一點等到對當地有些厭煩時就會開始去研究一些當地的情形。

李老師再回過頭講到出國方面的議題，第一個出國的重點就是要懂得瞄準最棒的目標，因為畢業的學校將來會影響找工作的機會。雖然進去機構之後是各憑本事，畢竟到那時候大學名氣響亮但個人能力不足也不能夠支撐你繼續待下去，因此回到上述的第三個問題－「財」的問題，雖然一畢業起薪比較低，念完博士年紀也不小了，甚至可能比自己教的大學生薪水還低，但李老師鼓勵大家轉念一想，教學的好處在於可以做自己喜歡的主題，再者還有寒暑假，除了上課跟辦公時段外能夠自由運用時間等。

繼續談財的方面，有關台美或是台歐的交流，又或是說集體的方面，台灣已經做了非常多的國際研討會，這些基本上是要政府資助或者學校自己去尋求財路，但別忘記每次研討會結束的時候請要有出版物品，希望能夠把這些研討會拉出來，像是投稿或是編纂刊物、書籍等，基本上就是要有個紀錄，讓大家能夠留下一些回饋產物，他讚賞台灣這方面做的不錯。

李老師特別強調的最後一個重點就是台灣研究不要只是專注於在做選舉研究或是調查而已，回到牛銘實老師所講的，要是想到甚麼好的點子，可以去追求，像是司法政治，李老師就覺得蠻有意思的，並舉例近日他在做台灣社會行動的領域，像是太陽花運動，他希望能夠用政治科學的角度去切入，但很難找，事實上社會運動是很有趣的，集體行動可以進去認同政治學等等…諸如此類的議題，絕對不僅是選舉的研究而已，千萬不要把自己侷限住。

子議題2：從個人經驗出發給學子的建言

提議人：廖達琪（國立中山大學）

謝謝大家，感謝今天的主辦單位出錢請大家來，尤其廖老師是少數從南部邊陲上來，從政大畢業後逾四十年，今天是第一次畢業多年來不往選研中心跑，而是社資中心，這曾是廖老師在學時最常待的地方，再訪已經是滄海桑田，感慨於許多改變，非常感謝有這個機會回到社資大樓。

接著要介紹並列舉過去自2000年到現在所參與過的許多計畫案，第一個是密西根大學的合作，做26國的地方菁英研究，年輕的同學現在的指導老師可能就是第一個帶著大家走上國際的。呼應李偉欽老師的看法，世界很大不用侷

限，研究主題很廣闊可以多方面探索。後來還有做台灣憲政改革的迷思探討（台法合作），因為法國是雙首長制的代表國家；接著就開始跟歐洲歐盟合作，廖老師並建議台灣可以開始以跟歐洲合作為方向努力，美國現在是霸權財大氣粗，但機會在歐洲其實也很多，談及沒有國家的支持，個人的杯水車薪猶如精衛填海永遠不夠，必須要有國家的平台，以前有國科會計畫，在過去陳水扁時期贊成學術研究的外交拓展，廖老師也贊成這種想法，所以當時希望大家都往歐洲，希望不要將一籃子雞蛋都放在美國，因此開始跟EUPF7合作接觸，看到科技部現在的做法有在試圖吸引更多跨領域的人很欣慰。

也因為國科會推動，所以廖老師第一波當年去歐洲訪視，當時是跟台大合作，因為一定要跨領域，不是只有社會科學還有人文，所以當年就跟台大國際交流中心主任沈冬老師一起合作爭取到了國家聯絡據點－歐盟科研框架計畫社會經濟人文科學主題國家聯合據點，這些年都在做這個平台，主要是幫助大家媒合找到歐洲的合作計畫，這是一個媒合的平台，本身並不是做科研，但是用於介紹跟協助大家怎麼跟歐洲的平台去做聯繫。關於這方面歐洲這幾年做的很厲害，他們知道怎麼吸引各國有才華有天賦的精英進入，很多都是跨領域跨國際合作，而廖老師所做的平台則是有在整個歐洲四十幾個國家都有參與，幾乎像是一個外交平台了。也因為歐盟計畫有一個合作在義大利歐盟歐洲大學研究所，他們的做法是只收博士生，算是很難申請到的計畫案，畢竟只限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的科目，廖老師借這難得的機會將iVoter引進了台灣、後續又做了俄羅斯主題的計畫研究，這次的主題跟搜尋網路有關，他呼籲在場學者一定要學習現在各種現成的軟體，現今有些技能是一定要學的，像他與文字探勘的淵源，儘管政治學界還不太認可這種方式，但廖老師覺得這種學習的過程是一生的，最後提及了2012則是到羅馬尼亞作研究，隨後便進入到結論。

由於上述這些合作也有一些出版作品，甚至政大的iConcern也是其中的成果之一，政大特別的成績是沒有做太多宣傳但有將近一千位教職員生上iConcern填寫建言，反觀中山廖老師花了許多心力只有一半的數量達成，他稱讚政大真是天生土壤肥沃，同時有頂大跟科技部的錢支持，也因為iVoter跟一些澳洲學者有聯繫。

回到主題，廖老師的重點是怎麼去開展、怎麼去跟國際學術接軌。第一

個，「心態」很重要，有意願去做最重要，但這個意願需要有很多支持，也就是「資源」，比方說國家補助，或其他單位援助，科技部或是蔣經國基金會等金援，尤其是科技部訂出重要的政策方向讓許多計畫得以申請到經費；接著是「主題」，廖老師的個人經驗多半與資訊有關，其實台灣有很多的大數據涉及兩岸的政治意識形態。「團隊」也很重要，廖老師長期跟資訊專業團隊長期合作，並且自己主動去根據議題需求甄補人才，就地取材在地經營，並舉例過去曾經爲了跟法文相關人才合作，跑去中央法文系招生，就有找到適合的人才。最後是「目標」，學術興趣很重要，當時在密西根大學，廖老師決定做立法研究，這是理性選擇下寧可走人跡罕至的路線，時至今日也覺得自己做的滿有趣的；第二個是國家外交，甚至是國防，這一點教育部的思考已經在改變，從歐洲學習到「解決真正的問題」（solving the real problem），最後是旅遊，靠政府出資去了四十幾個國家，如果大家對這方面有興趣，積極努力去爭取這些計畫一定可以開出更漂亮的國際之花。廖老師也表示，現在仍在繼續與國際合作中，當然需要科技部的大力支持。

子議題3：當今台灣政治學研究的成果評析

提議人：謝復生（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1981-1998在政大教學，到後來在美國教書一晃眼已有18年半的時間，作爲在座較資深的一位，稍微倚老賣老，過去在台灣只有中國政治學會，當時有幸獲選爲理事會中，成員多爲我的老師輩，當時提出辦年會是否應該有一些學術性的交流，是否應該有些人來提點論文等，但老師們多認爲年會是社交的場合，諸如此類的想法差距。

早年在政大教書是沒有研究室的，跟國外交流也十分有限，1982年中國政治學會創辦五十周年，猶記得當時連戰是理事長，關中是秘書長，當時開會謝老師問到既然要擴大辦理，要不要請一些國外的學者，當時秘書長關中支持，後來就有邀請。那在整個80年代90年代期間，國際性學術交流是滿侷限的，政府推動時基於學術外交的考量，往往有一些政治上影響考量，台灣自退出聯合國之後後有所需要，台灣對於美國一些學者的支持是淵遠流長的。

當時能想到的國際學術交流多半屬於中國大陸研究，也就是研究匪情等，

airiti

當時每年都有辦理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同時也有中日中韓中歐等，此類型居多，我們跟國外學者交流也偏重此類型，就連國外名校學者也會來台灣蹲點幾十次，借用國關中心的匪情資料，來研究中國大陸，到了90年代之後，許多年輕學者歸國，也比較能跟國外學術語言相通了，隨著解嚴選舉，包括台大諸多教授，政大選研中心等機構，吸引許多人做了許多調查，從當時開始與美國許多學術研究機後的聯繫，或是過去比較重視中國大陸研究，到在非中國研究方面現在逐漸增加，有人出去有人進來，政府支持也慢慢在增加，這是滿明顯的事情。

去年謝老師受邀擔任五年五百億頂大計劃的評審，看了十二個學校的自評書，花了许多心力與時間，頂大計畫強制要求各校詳細列明各面向國際交流的事項，國際學生、國際研究、或是國際學術計畫等等，那這方面佼佼者多為自然類組居多，跟政治相關的非常有限，選研或東亞研究屬少數，總體上看起來，至少目前的台灣在推動這類國際學術交流上是比過去要好很多，這個部分從頂大計劃能看到的有限，但就謝老師所知，許多同仁還有學生，走出國際後，尤其是美國的交流滿頻繁的，這些是與過去所不能相比的。今年年底謝老師自己辦了一個中國大陸研究，他預計起碼有二、三十位台灣留學者會去參加，這類活動的頻繁確實是與過去所不能相比的。

台灣的政治學跟台灣的政治研究是兩個不一樣的東西，台灣的政治學者所發表的論文內容跟當時政府的政策有一定關聯，但從台灣政治的角度來看，其中台灣研究還是佔了滿大的比重，就這個角度來講，台灣政治研究做得還不錯，堪稱成功。台灣政治相對於類似規模的國家，其實注目度不低，至少在過去吸引了許多人的注目，從早年經濟發展研究，後來民主化到選舉研究，兩岸關係等議題皆值得探討研究，當然包括中國本身是一個很有吸引力的主題，許多國際學者研究中國大陸同時也會多少了解台灣的議題，因此中國也連帶吸引了台灣被注意的可能，但在做研究過程中，錢的支援的確是非常關鍵的，台灣學者與國際學者所使用的語言多半是沒有代溝的了，有共通語言，但期許台灣學界能夠有更多的成果，提升台灣的研究能見度。而整體上來講，台灣做的不錯了。

子議題4：個人雜感與呼籲

提議人：黃紀（國立政治大學）

黃老師開場先慚愧於前兩場不在，因為剛好今天是老師授課的期末考，因為老師有當場解題的習慣，抱歉沒有準備太多，因為沒有那麼輝煌的紀錄可以跟大家分享，可能只能盡量跟大家談一點個人感觸與呼籲，提及串聯台灣跟國際政治學的研究，這是一個辛苦的工作，說到這個，過去黃老師在美國教書的時候，都不忘引述拿破崙的話：「It takes three things to win a war: money, money, money。」（想要打贏一場戰爭需要三個東西：錢，錢，錢）。談錢總是比較傷感情，但也許老祖宗給我們的教訓會講得更切合實際一些，在支援經費沒有大幅增加之前，做一件事情，要人就要錢，這個人就是能做是最重要的一個關鍵。那麼要串聯台灣跟國際政治學的研究，一定是需要有人很辛苦地來推動這個工作，說起這樣一個工作，基本上按照黃老師個人的想法，政府要在制度上面給予這些有心作推動的人，一個制度的誘因，這個誘因就是要讓投入這個工作之後，就可以馬上在在地的學術評量上能夠給這些人貢獻度的保障。

推動學術交流有點像是在做一個學術的基礎建設，如果觀察一下跟國際的學術交流，大致可分為兩種主要的交流型態，一個是個人的，與國外的合作往往能夠展現在出版品上，像是期刊論文或是專書，這些出版品在國內學術機構的計算中有囊括，因此有投入有收穫；當然這也是對於學術研究有很大的幫助，但他也具有一點排他性，因此可能有人亡政息的顧慮；第二種型態的交流則是屬於比較做基礎建設的工作，希望能夠有比較長期性的合作，未必一定要跟某些個別人之間聯繫上，但是是屬於比較細水長流的工作，舉例而言，這種搭橋鋪路的工作，能否搭建出一個學術交流的橋樑與平台，只要建立起來就能夠讓這些交流工作繼續，像是在美國的APSA（美國政治學會）裡頭1992年成立的台灣研究機構，這樣的組織25年過去了仍舊在運作，這樣一個平台就產生了台灣與美國學者之間很自然的連結；但是這種型態的交流建設不能苛求立刻拿出一個輝煌的成果，做研究要看長遠效益，能否是長久性的。

除了建立平台，也可以開創學術共通的資源，使台灣有資源去吸引對相關領域感興趣的國際學者加入合作，就能夠形成一個社群，如果能夠很努力去蒐集第一手資料，這樣的成果很珍貴，但要是能夠公開讓大家使用，這自然能更

融入國際社群，這也是建立長久管道的方式，但百變不離其中的重點角色就是人，要有人長期持續地去努力，這種推動不是短期能夠看到這種效果，必須要長期去耕耘。

黃老師並感嘆國內的學術評量標準，對於長期投入某些特定工作的人，不會給予肯定，不會因為串聯了學術資源等建設，不大有人懂得這些資源的付出也是很辛苦，就算這些平台仍然被使用者，但這些串聯式資源的創立人往往被遺忘在時間洪流裡。如果我們真地希望台灣與國際的串連更有利的話，我們就需要更多的人來長期投入，可是我們不能一方面呼籲，但一方面又不給予學術上制度的支援，這是沒有用的，在此呼籲應該要建立這方面制度的誘因，讓投入的人能夠立刻反映在評量的績效上。希望做到在學術界的人都能意識到，投入到學術的基礎建設，不只是爲了利他也是一個利己的機會，如果最後能夠做到這一點，大概台灣與國際學術串聯的結果上應該會更有成效。

子議題5：社會科學的另一種方向—連結自然科學的可能性

提議人：童涵浦（國立臺灣大學）

非常感謝主辦單位邀請，先回應蔡老師的國際人才的觀點，童老師自謙國內政治學圈子有更多人資格來回應這樣一個主題，他僅就自己的一點經驗跟大家分享。前面蔡主任提到走訪台大有看到國外教授的辦公室等，但其實許多國外人士來台灣是因爲配偶的關係，簡單講，以台灣目前的現況要吸引外籍人才確實不太容易，有些時候台灣頂尖學府能請到這些外籍菁英學者很多不是因爲現實上的利益考量，更多是其他因素。

童老師認爲兩岸三地從事區域研究的先進已經很多，他選擇不多談此一主題；同時，國際連結這個議題本身具有一定的爭議性。甚麼是國際？跟誰連結？這個議題的答案本身應該有一定的開放性，不必然是美國；但就他個人背景以及過去的國際連結經驗跟大家分享。

事實上，對於台灣政治學界，如何去經營國際連結，他並不是那麼悲觀，儘管在經費上可能與大陸相對比較遜色，但呼籲大家多思考，如果不以台灣爲範圍，政治學的進步很多時候都是來自外部的催化，近年來主流的數據科學研究也不是來自政治學內部，反而是來自資訊研究或是有資訊科學背景的人。

由於政治學基本上是一個非常重視實用的學科，其所關注的很多時候是一些現實的議題。因此政治學在理論建構上時常取自其他學科，像是經濟學或是社會學等領域。所以我們會有政治經濟學、政治社會學等，各自代表不太一樣的分析角度。政治學一直是從其他學科吸收理論來解釋現實的議題。這個現象在國際關係領域特別清楚，因為很多時候國際關係理論更重視的是即時的政策分析，而非建構理論。這也造成政治學每一波新的典範出現實際上都是外來的繼承。童老師常在思考怎麼樣去引領這個風潮，很多時候需要去了解其他學科的進展。從這個角度看，像廖老師先前就已經指出，跟資訊科技結合是一個十分具有潛力的方向。

目前幾個政治學裡面的新興典範，幾乎都是來自於大量微觀數據的出現。像是臉書這些網路上的媒體，它讓我們可以非常直接地觀測個體的行為。這個發展提供了政治學很多與其他學科合作的機會。

童老師發現近年政治學裡面做實驗的人越來越多，起源也是來自經濟學開始做實驗的緣故。他個人也有不少與經濟學以及腦神經科學領域學者的交流經驗。當然這並不是說政治學者要變成那個學科的專家，而是要能夠回饋政治學研究，成為新的研究方向。目前由於微觀數據的出現讓大家可以有非常多利用社群媒體的機會，諸如消費行為相關的研究，但也有不少同仁是針對網路上的政治行為與政治態度做研究，是非常有潛力的。再加上台灣的資訊科學與產業是具有世界性規模的。

接下來童老師講到自己近年來小有成就的研究領域——神經科學，這當然在政治學界是一個非常新的題目，大約兩年前他曾在美國政治學會年會發表過一篇相關的文章。他有感於神經經濟學在經濟學界有多年發展，但在政治學界中熟悉的人尚不是多數，但其實已有不少與政治議題相關的文章在各個領域的學術期刊發表。他提到美國政治學界對此一發展也有些許疑慮：包括怎麼樣去使用儀器，經費的限制，資料的分析方式等等……。

台灣也許對社會科學不那麼重視，但毫無疑問對自然科學有相當的投入，而自然科學研究領域內部有很多人對結合社會科學有高度興趣，而政治學者如果可以利用這些資源的話，其實大有可為。台灣其實有很多具有潛力與優勢的領域。若只盯著眼前的政治學相關領域，很難發現與其他領域的結合可能性。

airiti

台灣其實在跨領域合作上投入不少資源，可以思考怎麼樣去跟神經科學等其他自然科學的學科合作。台大對於跨領域學術合作十分鼓勵，想必未來也能在整個台灣鋪開來。而為了推廣這樣的合作，童老師也努力尋求與相關知識領域的人士合作，也有參與科技部的計劃，比較特別的經驗是之前曾與日本東京大學的加藤純子老師商討合作事宜，也增加了台灣學界的國際連結。

台灣學界其實也可以開創許多新的風潮，他不覺得目前美國政治學界有太多人關注到與神經科學連結這一塊。當然這樣的方式也有很多挑戰。他與這個領域的學者交往過程中，發現此一領域較受到心理學的影響，十分注重微觀層面的解釋，但童老師認為政治學不能停在這邊，應該去思考怎麼連結微觀跟宏觀。除此之外，還有另外一個方向，當然不是說區域研究沒有研究價值，只是需要將這些問題抽象化，建構成形式模型，這方面台灣要跟歐美學界連結其實也具有非常強的基礎，一方面我們生長在台灣，也自然清楚這個環境的具體脈絡等因素，差別只在於如何去抽離出來成爲一個比較具象的模型。

最後童老師總結到，現在大家如果有任何研究成果除了方向上的差異與既有的政治學相關研究之外，突破的方式不外乎要去國外參加多一些研討會，他覺得像美國政治學會是一個很好的渠道讓大家建立國際連結。